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突出作用

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为纪念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我们有必要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突出作用、特别是所作出的巨大牺牲奉献进行全面认识和充分了解，澄清否认“中国共产党是抗战的中流砥柱”，指责共产党军队“游而不击”“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等错误认识，以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 范景鹏

时间上，中国共产党是有组织开展十四年抗战的唯一政党

2017年春季中小学教材全面落实“十四年抗战”概念，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叙述中，十四年一直是不可分割的。早在1945年党的七大，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就明确说到：“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1931年就开始了。”在2005年、201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70周年纪念大会上，胡锦涛同志、习近平同志都沿用了“十四年抗战”的说法。从“八年”到“十四年”，不是数字相加和政党之间的意气之争，而是有着法理依据和史实根据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导致东北三省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沦丧、3000多万同胞被蹂躏。而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与国民政府截然不同的政策，事变的第二天中共满洲省委就发布了《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这是世界二战史上第一个反法西斯的正义宣言；第三天，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号召全国人民一致动员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

国际法上的战争或法律上的战争状态既要有事实的要素，也要有意识

的要素。战争的开始，必须通过宣战，可以不一定是布告宣战或宣战声明，只要有交战意向的明确表示即可，这样广义上的宣战实际上就成为国家关系由和平状态进入战争状态的一个重要标志。因而中共满洲省委和中共中央发表的抗日宣言，就成为中国“十四年抗战”法律上的重要证据。而国民政府因长期想对日妥协以息事，1935年还在日本“亲善”诱惑下将中日外交关系由公使级升格为大 使级。直至1937年8月14日才正式发表《国民政府自卫抗战声明书》，到1938年1月日本宣布不承认国民政府后才从日本撤除大使馆。

从史实来看，九一八事变后，约20万装备精良，建制完整的东北军“不抵抗”撤到关内，在这场近代以来最大的反侵略战争面前，无论是当时执政的国民党还是其他党派，都没能勇敢地挺身而出，只有中国共产党担负起了这一历史重任，其领导的东北红色游击队、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贯穿了十四年抗战的全过程。1938年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称赞东北抗联是“在冰天雪地与敌周旋七年多的不怕困难艰苦奋斗之模范”，1948年1月1日，中共中央东北局曾专门做出决定，称东北抗联“是中国共产党光荣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空间上，中国共产党承担了最艰苦的敌后战场战略任务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面临的最大

一场对外战争，作战空间空前广阔，沦陷区有26省1500多个县市，面积600余万平方公里。中国共产党成立于南方，七七事变之前，党的主要党员、组织、政权和军队主要在南方和西北地区。而抗日主战场的东北和华北地区，党组织不健全，党员人数较少，几乎没有任何的武装力量。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大胆实行“敌进我进”的方针，深入敌占区打击敌人，开辟敌后战场，承担了最艰苦的战略任务，连日军也称赞“有超乎常有以外的坚强意志”。最北边白山黑水的林海雪原中有东北抗日联军，从产生之初便孤悬敌后，其处境之惨、生活之苦、战斗之残酷，难以用语言描述。主战场华北抗日根据地，1941—1942年，千人以上万人以下的“扫荡”132次，1万—7万人的大“扫荡”达27次之多，有时在同一地区反复“扫荡”三四个 月。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每个敌后根据地几乎都面临日、伪、顽三方的夹击，几乎每个伪政权都把“反共”作为施政纲领，通过丑化共产党和共产主义，为反共防共及沦陷区清乡绥靖寻找理论根据。南方地区有新四军建立的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直接威胁汪伪政权核心区域的沪宁杭地区。华南地区有华南游击队，其下属的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是香港被日军占领的三年零八个月中唯一一支坚持抗日的武装力量。最南边赤日炎炎的天涯海角有琼崖抗日游击队独立纵队。这些抗日武装物质供给短缺，武器装备简陋，斗争环境艰苦。正如朱德在七大报告中所指出，“我们最困难的，是部队装备和军用器材问题”，“几年来解放区战场的胜利，便是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下，以自力更生的努力去获得的”。

值得一提的是，国民党也有敌后战场，在1938年冬的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上提出新的抗战策略：“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方为其前方，用三分之一力量于敌后方。”在每个战区配备若干游击纵队开

辟游击区和冀察、苏鲁两个敌后战区，最高峰时，国民党敌后抗日武装总计近100万人。1941年国民党军游击队是共产党军总数的263倍，枪支是4倍，但到1943年左右，基本上都丧失了。中国共产党从无到有在沦陷区先后建立起的19个抗日根据地，经历了无数次残酷的“扫荡”，付出了巨大牺牲，但日军没有从战略上摧毁任何一个根据地，反而是越挫越勇，越抗越大，一直斗争到日本投降！

效果上，中国共产党坚决维护民族独立和尊严，不愧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中流砥柱”的说法最早出现于1941年5月25日毛泽东同志所著的《揭破远东慕尼黑阴谋》中：“共产党领导的武力和民众已成了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是相对于“一切失败主义者和投降主义者”而提出的。

在国民党营垒中一直存在着“亡国论”的思潮，这是“不抵抗政策”的思想基础，七七事变之后，又有“再战必亡”的论调。在此影响下，据不完全统计，1937年7月至1944年12月，在国民党官员、军队中，先后投敌的有党政要员62人（其中中央委员20人），旅长以上的高级将领58人，成建制整军整师投敌充当伪军50余万人。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中国共产党内，通过积极的抗日形势和政策教育，全党上下精神振奋、士气高昂。在著名的《论持久战》中，提到“抗战”93次、“抗日”91次，提到“胜利”89次，“抗战”“抗日”与“胜利”的比例几乎是1比1，并指出“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正是由于我们党坚定的抗日意志和必胜的抗日信心，党内没有一名中央委员投敌变节，党领导下的军队没有一支成建制投敌。我军当时没有实行军衔制，而国民党军队旅级干部一般授予少将军衔，按此标准，《八路军》（表册）一书烈士名录（团级及以上干部）收录728人，而干部名册收录有团级以上干部3438人，以此数据进行计算，牺牲（或死亡）比例超过五分之一，其中旅以上干部牺牲102名。据《新四军英烈志》记载，新四军有350个团以上干部牺牲，其中旅以上干部牺牲45人。东北抗联牺牲的旅以上将领153人，华南抗日游击队牺牲的旅以上干部有2人，中共武装在抗战中总共牺牲旅以上干部达302人。由此可见，我党我军在抗日战争中作出了巨大牺牲，“中流砥柱”名符其实。

要警惕五种类型的“带病”官员

□ 吴海红

一段时间以来，落马官员中“带病提拔”的现象较为突出。针对这一现象，2016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防止干部“带病提拔”的意见》，对十九大之前各地做好换届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防范“带病提拔”，不仅能够疏浚干部队伍源头，而且对于削弱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有重要作用。因此，干部选拔任用要特别警惕和甄别带“病”干部的各种“病症”。

信仰缺失型的“蜕变干部”。政党是以信仰为基础凝聚起来的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共产主义为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共同理想的政党。每一位共产党人在入党的时候，就选择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党员领导干部更应该把理想信念的坚定性作为修身立德的毕生追求。尤其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各种思想鱼龙混杂，各种诱惑充斥环境，如果没有足够的精神之“钙”、牢固的思想之“魂”，领导干部就难以在大是大非和利益诱惑面前坚定立场，不为所惑。

从那些落马领导干部的忏悔反思当中不难看出，他们的腐化堕落，首先是理想信念的动摇开始的。领导干部信仰缺失，思想蜕变，就会滋生各种问题：有的面对社会上各种似是而非的观点，随波逐流，悲观失望；有的一旦仕途受挫，便心生抱怨，心态失衡；有的面对亲朋好友托关系打招呼，放弃原则，违规办事。思想上带“病”的干部，出问题早晚的事。选拔干部时，

理想信念是否坚定，政治上是否忠诚可靠，是必须把好的第一道关。

经济贪婪型的“敛财干部”。人的本性是多重的，既有善好的一面，也有贪婪的一面。如果制度缺失，监督乏力，走向贪污贿赂就是件很容易的事。随着消极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边腐边升”的官员层出不穷。据统计，在有的省已查处的领导干部中，半数以上属于“带病提拔”，有的一把手甚至带“病”在岗10年、20年，屡被提拔。对于那些走向贪腐之路的领导干部而言，腐败行为没有被及时发现，会更加助长侥幸心理，并进一步刺激腐败的欲望。如果在干部选拔中没能有效把好廉洁关，就意味着延长了他们腐败的潜伏期。从诸多的案例中不难发现，腐败犯罪的潜伏期与涉案金额之间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的关系，受贿几乎伴随升迁的全过程，甚至提拔重用的速度有多快，腐败的步伐就有多快。由此可见，敛财型干部潜伏的时间越久，其危害越大，给党和国家造成的损失也越大。

资历造假型的“弹簧干部”。资历在干部选拔任用中，往往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些人为了获得晋升的合适条件或优势地位，不惜代价，不择手段，弄虚作假。2016年中央组织部通报称，在省管干部档案专项审核中，420人因档案造假受到组织处理或纪律处分，186人因档案问题被记录在案，未查清前不得提拔或重用。正是通过严肃认真核查干部档案，发现司法部原政治部主任卢恩光1990年的入党志愿书中，竟写了学习邓小平同志1992年南巡讲话的体会。经进一步核实，其年龄、党龄、身份、学历、经历竟全部造假。干

部资历造假主要围绕“三龄两历一身份”进行。这些干部的资历犹如弹簧一样，可以任意伸缩：需要年龄大时就改大，需要年龄小时就改小；需要工龄提前时就提前；需要学历高时就改高，等等。

党员干部资历造假属于违纪行为。2015年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67条规定：“篡改、伪造个人档案资料的，给予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干部资历造假，既是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的表现，也为各种官场不正之风埋下隐忧。一个领导干部的履历信息可以随意篡改，暴露出有关部门监管不力，或者背后有不正当的利益交易。把好资历关，涉及到提高选人用人的公信力，保持干部队伍的纯洁性。

政绩掺水型的“牛皮干部”。科学的考核评价体系是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基础，也是管理监督干部的必要手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干部考核评价机制不断改进完善。但是，干部考核评价体系的科学性和准确性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尤其是绩效考核单一性过强，过分强调经济增长，难以摆脱“以GDP论英雄”的局面。在这种绩效考核指挥棒下，领导干部的升迁奖惩，被绑在了一系列与经济增长相关的量化指标上。一些领导干部奉行“数字出官，形象出官”之道，置国家、集体和群众利益于不顾，欺上瞒下，弄虚作假，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严重影响了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发展。

热衷于制造政绩的官员，往往显性政绩明显，隐性劣迹也很多，一旦不能及时发现其隐性劣迹，使其蒙混过关，其“病症”就会慢慢显现出来，原来的

“小病”很可能会渐渐演变成“大病”“重病”，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损失。这些官员努力制造政绩的本质是“官本位”思想作祟，而拼命谋官往往又与谋利难以截然分开。在错误政绩观的驱使下，许多弄虚作假的提拔晋升干部背后都有一本贪污腐败的肮脏账本。

生活腐化型的“贪色干部”。官员沾染美色、生活腐化一度成为官场腐败齐头并进的两大景象。一些腐败官员就是带着“贪色”这样的“病”一路高升的。

从法律上说，官员养情人除非构成重婚罪，否则并无明文规定禁止。但是在党纪上却是不能容忍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零三条规定，搞权色交易或者给予财物搞权色交易的，属于违反廉洁纪律。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与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造成不良影响的，属于违反生活纪律。领导干部不同于普通人，他们的道德问题，不仅影响其个人，对社会道德和社会风气更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因此，对官员的私德、私行的要求高于普通人，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而且干部的生活作风问题和腐败之间往往也有着直接关联。从诸多贪腐案例中不难发现，一些领导干部走上腐败犯罪的道路，与私生活作风不检点有很大关系。权色交易不仅助长了贪腐之风，还冲击了人事制度的权威性，干扰了正常的干部选拔程序。“贪色”干部“带病提拔”，长期潜伏，其危害自是不言而喻。

参考与建议

“党性”概念的由来与意涵

“党性”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核心理念，最早源于列宁《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一文，文中指出：“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作任何评价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其后不久，他又在《“非党”抵制派的错误议论》一文中指出：“党性是高度发展的阶级对立的结果和政治表现。”这一论述诠释了党性的本质就是阶级对立的产物，深刻说明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性，是无产阶级党性最高、最集中的表现。

在我党历史上，“党性”这一概念最早源于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文中指出：“为了党的、无产阶级的、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的事业，能够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党性’或‘党的观念’、‘组织观念’的一种表现。”这里将党性从组织层面进行了分析，表明了党性就是个人利益服从组织利益的一种外在表现。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指出：“党性是共同的性质、普遍的性质，全党每一个人都有的性质。”并且强调：“我们要使许多自觉的个性集中起来，对一定的问题、一定的事情采取一致的行动、一致的意见，有统一的意思，这是我们的党性所要求的。”这一论述从个人与组织、个性与党性的关系上，进一步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党性及其要求。

中国共产党的党性，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阶级性、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中华民族优秀品质的集中体现，其本质属性是先进性和纯洁性。一方面，它表现在党组织的整体上，集中于党的性质、宗旨、指导思想、奋斗目标、组织原则、优良作风等方面；另一方面，党员是党组织的细胞，党性还具体体现在每一个党员的政治立场、思想观点、理想信念、道德操守、工作作风、纪律观念和工作实践等方面。

“党性教育”广义与狭义解读

1941年1月，中共中央明确要求加强“全党特别是军队中干部与党员的党性教育与党性学习”。此后，“党性教育”这一概念经常出现在党的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之中。《中国教育百科全书》认为，“党性教育”指的是“用无产阶级的优良特性、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作风对每个党员进行本质的改造”。

在考察党内文件和领导人讲话所处语境，以及综合理论界、学术界相关观点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对于“党性教育”这一概念可作广义与狭义两种理解。从内容上看，狭义上的“党性教育”是指党的性质宗旨、指导思想、理想信念、方针政策、规章制度、历史传统、优良作风等方面的教育；广义上的“党性教育”则还包括道德品行、法治思维、反腐倡廉等方面的教育。从形式上看，狭义上的“党性教育”主要是指与上述内容相关的集中辅导授课；而广义上的“党性教育”，既包括有组织的集中教育，也包括日常的党员个人教育。

“党性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异同

在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中，还经常使用“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概念，通常定义为“一定的阶级、政党、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其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

思想政治教育与党性教育由于性质、地位、对象、任务的不同，其内容、作用和要求也不尽相同，它们既紧密联系，又有所差异。思想政治教育与党性教育都是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不同于其他任何政党的特有政治优势。作为党的重要工作的双翼，思想政治教育面对的是全体人民群众，而党性教育面对的是全体党员，其内容既有交叉又有融合，既紧密联系，又层次不同。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主要体现了对人民群众进行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法治观、创造观教育以及健康心理教育等；党性教育的基本内容，则更加突出“姓党”，更加强调通过教育以提高党员的理论修养、政治修养、道德修养、纪律修养、作风修养等。因此，可以说党性教育是在普遍的思想政治教育基础上对于党员的标准更高、内涵更深、要求更严的一种特殊教育。

“党性教育”与“党性修养”“党性锻炼”的关系

“党性修养”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和自身建设实践中，将“党性”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核心理念同中华传统政治文化的“修养”结合在一起所产生的一个全新概念。党性修养是指党员个体通过自觉自愿的努力，积极主动地把政党的内在本质规定性内化为党员个体的价值追求和内在品质，并在思想和行动上体现出来的过程。党性修养必须通过党性教育并为党员个体所接受才能实现真正转化，而党性教育则必须通过党员个体的党性修养变化程度才能检验其效果如何。党性教育和党性修养是相辅相成的，相互支撑，相互促进。可以说，党性教育是外在的，党性修养是内在的；也可以说，党性教育是有组织的集体修炼，党性修养是党员个体的自我教育。

“党性锻炼”通常是指党员在工作、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尤其是在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中，自觉地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以增强党性修养的过程。党性锻炼与党性教育既是统一的，又是有所区别的。所谓统一，是指二者不能各自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它们统一于增强党性修养这个根本目的和党内政治生活这个“熔炉”之中。所谓区别，相对于“党性锻炼”侧重于实践提高而言，狭义上的“党性教育”侧重于理论提升，故二者之间是并列关系；同时，就广义上的“党性教育”而言，二者则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党性锻炼是开展党性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能够让党性教育的思想认知更好地转换到具体行动上，并加深认知程度。